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基层党组织 公信力功能与提升

李桂秋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209)

摘要:公共危机与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紧密相关、相互影响。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高低是公共危机化解或加剧的变换器,公共危机是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的特殊场域。公共危机为党组织特定支持输入提供了契机,但特定支持会随危机严重程度的递减而相应减弱,由此致使党组织公信力也随之变动。但随危机结束而消失的特定支持会累积在群众心里,成为弥散支持生成的基点,为党组织公信力的保持和今后提升奠定了基础。如此,基层党组织应将此次公共危机作为其提升公信力的一个特殊机遇,并助力化解公共危机。结合公共危机这一特殊情境,从信任的多维性质来考量,提升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化解公共危机,应主要从4个维度展开,即信任的胜任维度:提升党组织应对危机能力;信任的公开性维度:党组织信息全面公开;信任的客体特征维度:党组织凸显责任意识 and 担当精神;信任的主体心理维度:激发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公共危机;基层党组织;信任;公信力;特定支持;疫情防控

中图分类号: D 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20)02-0124-08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社会蔓延,这一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使党和全国人民都面临一场严峻考验。公共危机的突发性、时间性和破坏性等特征,要求危机管理主体必须反应迅速、信息畅通、正确决策,相应物资及时到位,这样才能使危机得到及时控制直至化解,这便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危机的有效应对和及时化解,需要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但具体落实和执行在基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战斗在一线,他们承担着大量繁重而细致的工作,这些工作成效如何关系到整个危机应对的总体效果。而基层工作质量有赖于党组织的有效协调和群众的积极配合,此时基层党组织公信力便发挥重要作用。基层

党组织公信力是指基层党组织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其政策和实际作为因反映并满足了群众的利益要求而赢得群众信任的能力。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由群众对党组织的较高价值认同、有效规约的基层权力、群众满意的执政绩效和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4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在实际情境中,基层党组织公信力与公共危机相互影响: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提高是公共危机化解或加剧的变换器;公共危机是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的特殊场域。如此,基层党组织应将这次公共危机作为其提升公信力的一个特殊机遇,并助力化解公共危机。

收稿日期: 2020-03-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提升研究”(16BDJ054)

作者简介: 李桂秋,法学博士,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基层党建研究。

一、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公共危机化解或加剧的变换器

“当一个明显的威胁性危机出现时,信任的突出地位(和估计的信任度)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1](P392-393)}因为“在危机期间对别人的依赖性更大,在这种依赖的基础上决定值得信赖的人和处理方法。”^{[1](P393)}由此可知,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对公共危机有着重要影响。党组织公信力高,会助力化解公共危机;党组织公信力缺失,则会使危机加剧。

(一)基层党组织公信力较高:助力化解公共危机

在公共危机期间,如果基层党组织公信力较高,那么它就会在决策、信息沟通、社会合作与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助力化解公共危机。

1. 促进分散化决策,节约时间成本

信任可以通过增强决策的分散化来节约时间,寻找对策建议以应对危机。“在危机时,如果允许员工决定哪些领域应削减或失去资源,哪些领域应得到额外的资源,那么花在寻找管理者同意的时间就可以用来执行资源的重新分配。”^{[1](P376)}基层工作也是一样,面对重大疫情,时间就是生命,资源决定成效,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普遍信任能够给予党组织成员及群众更大的自主权以处置应急事件。而群众对党组织的应急决策也因信任而甘愿执行。在这一简化的决策过程中,节约了上报、审定时间,同时使应急资源得到迅速而合理的流动,这对于疫情的防控、处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2. 实现无曲解沟通,全面掌握信息

高质量的无曲解沟通会提高开发和集中充足资源以应对危机的速度和程度,而充分的相互信任能够增加无曲解的、真实的和公正的信息的获得。在危机事件中全面准确地掌握相关信息至关重要,它决定着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的准确程度。在这次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党组织需要全面掌握辖区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情况、感染人群、密切接触者等等尽可能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取

难度比较大,工作比较细,环节比较多,而且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群众的积极配合,如实提供。而一旦出现误报瞒报现象,则极有可能造成疫情严重扩散,给疫情处置带来更大困难。此时党组织公信力将发挥巨大作用。如果群众充分信任党组织,认为党组织此时的工作关系到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也相信党组织有能力将工作做好,他们便愿意向党组织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这种准确、畅通的沟通方式所带来的信息必将有利于党组织就辖区情况作出正确判断,从而采取有效方法来抑制疫情发展。

3. 促进社会稳定有序,营造有利社会环境

“在市民社会中,信任构成秩序的基础——使形式上自由的人能相互交往(包括事务性的和个人性的。)”^[2]更进一步讲,“任何建构社会秩序和互动的社会架构的连续性的长期努力都必须建立在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的稳定关系的发展基础之上。”^[3]信任通过对人们行为一定程度的限制,为市场秩序的建立做出了贡献。面对突发的具有较大破坏性的危机事件,公众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恐慌心理和非理性行为,这种恐慌心理和行为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纾解将会造成严重社会后果:要么会使危机迅速由自然危机、灾难事故演变成社会危机;要么使危机迅速蔓延以至于难以控制。因而党组织必须采取措施对这种心理和行为加以引导和调整,使之恢复到正常社会秩序。此时党组织的引导和调整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组织公信力的高低。信任能抑制群体内的敌对和对陌生人的恐惧,消除对他人的疑虑并消解群体内的争执,缓解危机面前的恐慌、焦虑心理,由此形成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而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恰恰是危机应对中最需要的,它为危机的有效化解提供了特别有利的社会条件。

4. 达成有效合作,聚合全力解决问题

“信任是一个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产生并维持团结的整合机制”^[4],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合作的润滑剂,而且信任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5](P82)}。也就是说,信任促进了合作,而合作反过来又产生了信任。集体中的信任对激发集体士气,完成集体任务具有重要作用,彼得什托姆普卡将此称之为“工具性信任”。“这些多重的、纵横交

错的信任之线加起来形成了一般化的信任氛围或气候,我们隐喻性地称之为团队精神或团体士气(group morale)。”“团队精神的出现是取胜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5](P84)}在突发危机事件中,团结合作尤其重要。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任何单个组织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它无法单独满足应对危机的所有需求。因此,作为党组织要有效地整合调动辖区内的所有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信任是合作的基础,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更倾向于与一个值得信赖的组织达成合作。因而党组织若公信力较高,它便会将更多主体吸引过来参与合作,以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应对疫情防控,为危机的化解共谋对策,如此才能够有效应对这次重大疫情。

(二)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缺失:公共危机加剧

在社会危机状态下,如果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缺失,则可能会导致社会失序、群众退场、危机叠加,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危机加剧。

1. 社会失序

公共危机通常以极大的破坏性为特征,而危机期间焦虑、恐慌甚至无助也是危机中人们共有的心理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更倾向于各自为政,焦急地去找寻避免个人损失或遭遇更大危害的途径方法,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此期间还有可能会伴随谣言肆虐,更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与无序行动,所以公共危机本身就与社会无序相伴生。此时唯一可以被期待维持社会秩序的便是权威当局。而危机期间,人们通常会对权威当局有着较平时更加深切、强烈的企盼,而一旦权威当局没能够满足人们的强烈期待,甚至其行为一再让人们失望,其结果就会导致“期望-收益比”一再扩大而无法弥合。正如亨廷顿所言:“在渴望与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满足之间造成巨大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了社会颓丧和不满。”^[6]这种情况若发生在基层社会便导致党组织公信力流失。党组织失去公信力意味着集体合作无法达成,其所制定的政策难以有效执行。也意味着人们的恐慌、焦虑心理加重,而这种心理又助推了无序行动,由此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无疑加剧了公共危机。

2. 群众退场

一旦群众对党组织失去信心,群众便会从公共生活中全面退场。主要表现在:一是消极冷漠。因为对党组织不信任,群众对党组织组织的任何活动都失去了热情、耐心,甚至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或表示抗议。二是不作为。群众在不信任党组织的情况下,对党组织所发起的公共活动不予任何回应,不到场、不参与、不理睬。群众退场对公共危机应对极为不利。作为危机应对主体,党组织需要群众的积极配合,尤其是党组织制定的政策需要群众的响应、执行,更需要群众在危机中发挥能动性、创造性共同参与寻求解决危机的进路。而群众基于不信任的退场使党组织处于孤立状态,成为应对危机的孤立主体。

3. 危机叠加

党组织公信力缺失不仅会加重公共危机,而且也有发生次生危机的风险。首先,信任一旦被破坏,群众不仅对党组织失去了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情绪会波及到社会关系,影响到人际信任,使人际信任也随之坍塌。在公共危机期间,一般应对资源相对有限,失去了组织协调与互信的人们会导致为争夺稀缺资源而发生纠纷的现象出现,加重了社会矛盾。如在疫情防控中,人们可能会为争夺口罩、消毒用品或出入社区、村的通行证而产生纠纷,这无疑加剧了疫情防控工作难度。其次,公共危机发生期间,谣言极易得到传播并引发人们的关注和非理性思考的跟风,而权威声音是制止谣言最有力武器,但当党组织失去公信力的时候,其权威声音已成为群众不闻于耳的噪音。这如同塔西佗陷阱理论所揭示的,权威一旦“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会同样引起人们的厌恶。”^[7]结合公信力,其意思就是说,当公权力部门失去公信力的时候,不管你是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认为你是在说假话,做坏事,都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批评。此时若导致谣言泛起便有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尤其是疫情期间人们宅在家里,网络成为了人们获取外界消息的主要渠道和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并且疫情中人们本就焦虑敏感的心灵极易被谣言操纵。因而,危机叠加危机会导致危机恶化。

二、公共危机: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的特殊场域

“危机对于信任的创立和破坏是一种独特的严峻考验。很少有其他条件提供如此重要的机会加强信任,正如一个人对处于危难之中的某人提供出人意料帮助。”^{[1](P398)}或者说“危机意味着桌上更多的筹码,筹码越多,输或赢、处理或不处理的结果就越大。与别人相联系,对于别人的帮助的依赖越大,获得更多帮助时的感激越多和得不到时的愤恨越大。”^{[1](P399)}由此可见,公共危机对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党组织如能抓住积极的一面,公共危机就会成为提升自身公信力的特殊机遇。

根据戴维·伊斯顿的理论,政治系统的支持分为特定支持和弥散支持。所谓特定支持是指:“支持的输入有时是对于系统成员为其自身利益提出、将要提出或已经提出的一个需求给予某些具体满足的一个结果,当支持是以这种方式对需求得以满足的一个报酬时,我将它称之为特定支持。”^{[2](P257)}在公共危机这一特殊情境中,人们提出了相应的化解危机的需求,如果党组织能够给予满足,那么因这种需求被满足而得到的支持便为特定支持,在特定支持下党组织公信力得到增强。但由特定支持的特点决定,其会随危机严重程度的递减而相应减弱,由此致使党组织公信力也随之变迁。

(一)公共危机逐渐加重:特定支持输入,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增强的特殊机遇

在公共危机暴发并逐渐加重的态势下,群众有着强烈的依靠党组织共同应对危机的愿望,如果此时党组织能够满足群众的期待,则随着特定支持的输入,党组织公信力增强。

1.提升党组织形象:党组织能力的集中快速彰显及群众的即时感知

按照学者徐彪所述,基于信任周期理论阐述政府信任变化过程,公众对政府信任分为初始信任和公众后续在与政府接触、交往中产生的信任。所谓初始信任,就是公众在与政府部门没有交往历史的

情况下,从群体成员、刻板印象中产生的认知线索;公众后续与政府接触、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信任是指政府向公众传达了政府部门是怎样一个组织或系统,其价值和宗旨是什么。这些概念会让公众感知到政府部门作出的一种非正式承诺。基于这种非正式承诺,政府部门和公众之间形成某种隐性契约即心理契约,公众在与政府交往中会根据心理契约来对政府部门进行评价,判断政府部门所展示的行为与其宣传或者承诺的是否一致。若一致,便产生了信任感;不一致,则政府公信力降低^[3]。根据笔者前期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调查结果表明,对其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43.6%,以此大致预测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基本处于此水平上下,可以将此标准视为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初始信任。一般而言,初始信任越低,公众对党组织在公共危机期间的实际作为所取得的成绩的心理预期就越低,而党组织通过在危机期间的努力作为,其公信力就越容易得到提高。反之亦然。而基层党组织初始信任处于此水平并不算高,因此可视为其在公共危机中越容易提高公信力。公众在与党组织接触中产生的信任,则主要依靠党组织自身的作为。此次疫情防控为党组织主动作为,彰显能力提供了一个特殊机遇。如果党组织能够有所作为,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待,而群众特定期望的回应危机中更容易被其感知,由此便大大提升了党组织的形象,从而增强了党组织公信力。

2.构建新的信任支点:重建利益关联

所谓利益关联就是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建立广泛联系。信任关系建立的条件之一便是主客体之间要有利益关系。而罗素·哈丁更是将信任的概念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他指出:“说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有理由期望你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在相关事情上作为我的代理人行事。你的利益暗含着我的利益。”^[4]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推进,党组织功能发生转变,由依靠管控转向强化服务,且随着社会发展及市场经济推进,单位制被打破,个人日益原子化,由此给基层带来的影响便是党组织与群众之间利益关联弱化。近期针对农村、社区开展的调研也再一次印证了这一事实。这就导致群众对党组织依赖性降低,接触机会减少,使党组织公信

力提升缺乏有效信任支点。而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全体公众同时面临着共同的健康与生命安全问题,控制疫情扩散成为了共同的愿望和任务。这一特殊的利益维护的需求将党组织与群众缠绕在一起,若此过程中党组织大有作为,将是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重要节点。

3. 凝聚价值共识:共同的利益追求与维护

戴维·伊斯顿指出,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能够成功地捕捉系统大部分成员的想象力,并激发他们的期望,那么,随着一个意识形态明确或含蓄提出的诺言和目标的实现,它在社会成员中引起的满足将足以保证支持的继续输入^[8](P280)。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价值认同也是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认同并非虚幻,它根植于集体当中的共同利益,并在追求与维护共同利益中得以形成并强化。“一个共同利益的思想会有助于维持对权威当局和制度规则的一种更为广泛、弥散支持的输入。”^[9](P300)基层组织因原有共同利益较小且分散,所以缺乏“捕捉成员想象力”的价值认同基础。而此次疫情防控,为党组织提供了增进价值认同的特殊机会,而且人们基于共同防控的一致行动,使人们再次感受到了集体归属感以及为集体贡献一份力量后的存在感、满足感、荣誉感,这种内心感受逐步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心理,其反映在行动上就是增加了对党组织的支持和信任。

(二)公共危机减弱:特定支持减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同步减弱的晴雨表

特定支持形成于对执政当局具体政策及政绩的即时反映,由特定支持特点决定:“这种支持(特定支持)随现实利益或满足程度而发生变化,”“一旦这些利益和满足程度下降或终止,那么,特定支持也相应的会发生衰减或终止”^[10]。公共危机严重时期,人们基于对党组织的强烈依赖和共同应对危机的需求,为党组织提高公信力提供了特殊机遇。但随着公共危机被有效控制,危机明显减弱之时,情况发生了转变,此前危机严重时期产生的特定支持衰减:首先,利益关联弱化。曾经因共同应对危机的利益需求将党组织和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党组织能够赢得群众信任构建了短期的新的信任

支点,但随着危机逐步减弱,个人自由行动空间变大,对党组织的特定依赖性降低,信任的主客体双方以共同应对危机为纽带的利益关联弱化,致使二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缺少了足够分量的中介,因而党组织公信力呈现衰减趋势。其次,价值认同淡化。源于为应对公共危机而形成的共同利益的追求与维护的价值认同也因公共危机的逐渐减弱而随之淡化,个人会逐步从集体一致行动中退出,回到平时生活中对个体利益的关注,逐步回到原子化的个人状态,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要素再次减少。

(三)公共危机化解:特定支持消失,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持续衰减直至恢复原初水平

就政治支持而言,伊斯顿区分了政治支持的二元维度:特定支持和弥散支持。弥散支持来源于长期社会心理作用的结果,它是由不断发展的社会化过程和对执政当局政绩的累积性评价等社会心理因素作用而成,因而比较稳定。而特定支持源于对群众特定利益的满足或者说对执政当局具体政绩的感知,特定支持的变化紧扣政策和政绩的变化,所以相对而言,特定支持很不稳定,容易发生变化。因公共危机爆发所产生的特殊情境为党组织特定支持的输入提供了一个短暂性契机,但随着危机过去,群众生活恢复常态,因危机发生而建立起来的利益关联和价值认同也随之消失,党组织公信力衰减。但党组织公信力衰减会经历一个过程,而不是即刻恢复原初水平。因为在危机中,群众对党组织成员可能由原来的不认识、不熟悉到耳熟能详,对党组织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有了切身体会和良好感知,这种在心理产生的肯定认知不会随着危机结束而即刻消失。此外,虽然特定支持消失,但是党组织在危机中所作的工作,取得的成绩,群众的积极评价,会累积在群众心里,成为弥散支持生成的基点,为党组织公信力的保持和今后提升奠定了基础。

三、路径构建:提升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化解公共危机

信任是一种多元结构,结合公共危机这一特殊

情境,从信任的多维性质来考量,提升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化解公共危机,主要从4个维度展开,即信任的胜任维度、公开性维度、客体特征维度、主体心理维度。4个维度的内容与党组织公信力构成要素相连,是党组织提升公信力,化解公共危机的必要因素。

(一)信任的胜任维度:提升基层党组织应对危机能力

在公共危机中,胜任是存在于组织和个人之间一种信任维度。应对、化解公共危机是组织成员首要的、核心的利益期待。党组织在危机中被赋予领导职能,其能否带领集体走出困境,考验着党组织的能力,也是党组织赢得成员信任的最佳时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党组织需要具备和提升以下主要能力:首先,组织动员能力。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导主体,也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可以包揽一切,基层社会发展有赖于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而如何调动各主体积极性,则取决于基层党组织动员能力的高低。在危机情境中,组织动员能力更加关键。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面对高传染性的疫情和大量工作,党组织需要组织动员辖区内所有力量共同参与,其中以党员为主体,包括积极分子、群众及辖区内其他主体,如企业、店铺等组成联防联控严密防线,只有各个主体共同参与才能使疫情控制取得最优效果。其次,协调能力。在疫情防控中,各个层级组织都需要一个总指挥。在基层,党组织就是中枢。面对众多繁杂、多头、细致的工作,党组织必须要有效协调各个方面工作,如对内协调好组织分工,对外协调物资采购、群众生活保障等等,保证各个环节从容有序。再次,应急处理能力。应急处理能力是危机管理主体必备的能力。在危机发生期间,随时可能会遇到突发事件,如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可能会遇到谣言传播、聚集性传染事件等,需要危机管理主体即党组织做出准确研判、拿出有效决策,进行果断处理,否则可能会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总之,党组织在危机应对中能力的突出呈现就是党组织赢得群众信任的关键要素。

(二)信任的公开性维度:党组织信息全面公开

信任的公开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任客体相关信息公开。一种理论认为信任来源于理性选择,即基于对他人的了解或利益的算计而产生的信任。“一个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利益诉求有精确评估,知道其在考量了其他可能的行动后仍会表现出可信赖性,只要此行动满足了他的利益诉求,他就会报以一种信任的行为方式。”^[12](P96)詹姆斯·科尔曼展现了一个预期效应最大化模型,认为对于一个理性行动者来说,成功机会与失败机会的比例大于可能所失与可能所得的比例,这个理性行动者便应该给予信任^[13]。理性选择的考量有一种知识论的性质,即信任者获得关于被信任者一定的知识和信息,且获得的知识和信息愈多,对被信任者了解的愈多,可供理性计算的材料也就愈多,从而给予被信任者以信任的可能性就愈大。联系这次疫情防控,党组织要尽量公开其在疫情防控中采取的各项措施、实施的方式以及取得的效果、存在的问题,让群众能够了解到尽可能多的信息。二是具体事件过程信息公开。就具体事件而言,关于事件本身的具体信息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可减少信任主体的猜疑,为获取主体信任降低了过程成本。如在疫情防控中,党组织要对疫情的发展程度、危害、预防的方式方法以及本区域疫情发展情况(确诊人员数量、疑似感染者居家隔离情况等等)都向群众及时通报。在当前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及时公开相关信息还可以有效避免谣言泛起引发群众恐慌,同时由党组织这一权威主体占领舆论阵地,实时更新发布最新信息,更加凸显了党组织的威信,增强了党组织的可信性。

(三)信任的客体特征维度:党组织凸显责任意识 and 担当精神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信任产生来源于3种模式,即来源于过程的信任、来源于特征的信任、来源于制度的信任。其中来源于特征的信任嵌入在社会关系脉络中,强调普遍的成员资格和相似性。根据党的性质和宗旨,基层党组织所具有的主要特定特征应为:为民、廉洁、勤政、责任和担当,这是党组织赢得群众信任的组织特性和本质。而在公共危机

发生期间,党组织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尤为重要,这也是此期间群众最期待的组织品质。其中,责任性本身就是信任的基础,“从被信任者的视角来看,责任性意味着不实现信任或是背叛信任是很难的,因为它不会不被侦查和不被惩罚。而从信任者的视角来看,它使给予信任或把某种有价值的事物委托给被信任者更容易。责任性消除给予信任的障碍并鼓励一种更开放的信任态度,因为它给信任者提供一种防止可能损失的保险,一种防止潜在的信任背叛的备用选择。”^[5](P117-118)]因此,面对疫情防控的重大任务,基层党组织在工作中要承担起基层防控的重大责任,摒弃官僚主义,不搞形式主义,不退缩、不懈怠,用最踏实的作风将防控工作做实做细,践行人民公仆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将基层疫情防控的关键防线扎牢。

(四)信任的主体心理维度:激发共同体意识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将信任进行划分,其中一种信任就是基于群体和网络身份而有的信任,他指出:“信任在那些自以为同属于一个群体的人中间更容易发生”。^[12](P105-106)]汤姆·泰勒也提出:人们“因为对群体与团体价值的认同而产生对团体的义务感。此认同形塑着他们的行为,导致了不因为对别人行为有所期待而有的合作”^[14](P288)],他称此为“社会信任”,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在有社会联结的群体中,对信任判断“会更关乎认同,而更少关乎资源交换”^[14](P289)]。所以,激发共同体意识,尤其是在危机发生期间,强调利益共同体,增强集体认同,有利于信任的产生。“由于认同意识,信任文化增强了个体与共同体(家庭、民族、教会等)的联结,并产生强烈的导致合作、互相帮助以及为他人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倾向的集体团结。”^[5](P141)]由此可见,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助于信任的产生,而且还在信任的激发下促进了集体团结与合作,创造了“一个比各部分简单之和还要强大得多的结合体。”^[1](P162)]这又恰是公共危机应对中所需要的。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基层党组织要利用宣传、服务等方式激发群众的共同体意识,使集体中的每个人都因共同的利益与目标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在共同协作中增进共识,

建立和强化信任。而在普遍的人际信任强化的同时,也增进了对党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四、结 语

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境为党组织提升公信力提供了机遇。但如果党组织在危机中消极无为,这种情境也会成为党组织公信力解散的特殊场域。“信任是件易碎品”,建立起来很难,且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摧毁只需一根稻草。为了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基层党组织要全力维护好已经建立起来的公信力,同时把握住每一个提升党组织公信力的契机。但类似于因公共危机等特殊情境带来的特定支持输入而促成的党组织公信力的提升不甚稳定,因而,从长期来看,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提升还是要依靠弥散支持的持续输入。弥散支持因其是长期社会心理作用的结果,它是由群众在对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现实所做的长期且系统的思考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其更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更加稳定。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把握党组织公信力的4个构成要素,即群众对党组织的较高价值认同、有效规约的基层权力、群众满意的执政绩效和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在这4个方面持续作为,让积极评价和高度认可在群众心里逐渐积淀而成为长久的信任和支持,如此,才会使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 [1] (美)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组织中的信任[M].官兵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 [2] Silver,A. “Trust”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G.D. Suttles, M.N.Zald.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ontrol [C]. Norwood,Mass: Ablex Publishers,1985.56.
- [3] Seligman,A.The Problem of Trust[M].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14.
- [4] Barber,B.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M].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3.21
- [5] (波兰)彼得·什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 [6]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1.

- [7] (古罗马)普布里乌斯·克奈力乌斯·塔西佗.历史[M].王以铸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7.
- [8]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徐彪.负面事件后政府信任危机的形成机制研究:一个准实验研究[J].学海,2019,(2):114.
- [10] (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24.
- [11] Easton,David.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975.437.
- [12] (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M].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13] (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08.
- [14] Tyler,Tom.Why Do People Rely on Others?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Aspects of Trust[A].K.Cook. Trust in Society [C].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1.
- 【责任编辑:张西山】

Function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the Credibility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Major Public Emergency Crises

LI Gui-qiu

(College of Marxism, 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Abstract: Public crisi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interrelat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determines whether the crisis is resolved or intensified. Public crisis is a special field affecting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o provide specific support, but the specific support decreases when the crisis gets less seriou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hanges accordingly. However, the specific support disappearing as the crisis comes to an end will be cherished by the public, and become the basis for more supports,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herefore,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hould take the current crisis of Covid-19 as a special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credibility and help resolve the crisis.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situation of the public crisis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credi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credibility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resolve the public crisis from four aspects: in terms of credibility competence, we need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o deal with crisis; in terms of credibility openness, we should mak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fully open; in terms of the o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credibility, the party organization should prioritiz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in terms of subjective psychology of credibility,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hould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community.

Key words: a public emergency;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rust; credibility; specific suppor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